

难忘的历程(一)

■ 郝永胜 忆述 杨树恩 整理

一、走向光明

从我记得事起,家乡就笼罩着天灾人祸和兵荒马乱,我从九岁起就开始搅工放牛,我的六个姐妹,有的从小就当了童养媳,一家人住在一丈见方的一个土窑洞,一个小水瓮,四、五个盆盆罐罐,放一点棉蓬、灯草之类的草籽,这些就是当时的粮食。

我在童年时代,几乎从来没有过欢快,到了十四、五岁,经常思考怎样摆脱痛苦的现实,想来想去觉得当兵是个办法。过了些时候,自卫队排长王六十八招兵买马,听见我想当兵,专门来找我,我答应和老人们商量。可这件事让杨培森知道了,一天,他专门来我家谈叙了好长时间,他对我说:“听说你想当兵呀?其实去自卫队当兵,还不如去念书识几个字。”

“到哪儿去念书?”我和老人都惊奇地问。

“到后套五原。”

“咱穷人家怎能念得起书?”

“那里有个公费学校,又念书又生产,不用交学费。”

老人们听了他的话,还在犹疑。杨培森临走时又叮嘱说:“你们好好思量,慢慢打一打主意。”

转眼到了第二年夏天,我十六岁了。一天,杨培森又来到我家,这次他住了一夜,记得他说:延安有个毛泽东,领导穷人闹革命打天下,帮助咱穷人身解放,青年人到了那里又能学文化,又能学武艺,能学浑身本事,去延安就等于走到了新世界。

秋收时分,杨培森再次来到我家,我们留住他又住了一夜,他这回又讲了很多革命道理,鼓励我走光明大道,到延安去。我父亲得很兴奋,叫我跟上杨培森走吧。我们这时才明白,杨培森不单是个私塾先生,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,他听说我想当兵,怕我走到邪路上去,费这么大的功夫,做我们一家人的思想工作,要把我引上正路。这次我们商定了走的大体时间。

一九四一年正月初九,杨培森来到我家。他开门见山地说:“走哇,还有后沟的刘德明。”母亲一听说就要走,连忙动手给我缝补褴褛的衣服鞋帽,汗珠和眼泪一齐往下滴,也顾不得揩一下,缝好衣裳后,她说:“他叔,我把娃交待给你了。”

我们走的时候,母亲把家里唯一的一块钱给了我,老人们把我送得很远,直到互相都瞧不见了,我还忍不住一次次回过头瞭他们。我们把刘德明找上后,一起走上了奔向延安的道路。

当天晚上,我们到了青达门,和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人杨柱、王光先住到了一起。他们商量决定由王光先送我们。王光先嘱咐我们,路上要是碰见国民党的卡子查盘不要怕,就说咱们是寻马的。第二天大清早,王光先就和我们一起动身,走了七八天,到了鄂托克旗的乌素加汗。这天太阳快落山的时候,我们走近了一个村庄,突然从路旁的柠条林里跳出两个带枪的人来,大声喊:“站住!”我和刘德明都有些慌了,王光先和杨培森上前和他们接话,王光先写了个条子交给一个哨兵拿着向村里走了。

过了一会,那个哨兵出来让我们进村,杨一木和李维新两位领导人接见了我们。几天以后,我和刘德明都领到了一套土布灰色军装,过了几天,我们接到通知,准备出发去延安。

在去延安的路上,杨培森介绍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一个月以后,我们终于到了革命圣地延安。

二、延安受命

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五日,按照组织的安排,我们十

多个青年,由彭达同志带领,从乌素加汗出发,奔赴革命圣地——延安。

从乌素加汗到延安,步行共走了一个来月。经彭达同志联系,安排我们住在西北局招待所。彭达同志住了中央党校,我们住了延安抗大民族部(后来改为民族学院)。该院于一九四四年四、五月间,迁到城川。一九四五年年初,我正式毕业,留校搞了几个月会计,后调到定边保安处搞特特工作。经过特工训练,组织决定杨培森、刘德明和我三人,到白区开展地下工作,组织给我们的任务是:配合贺龙将军解放包头,在伊盟一些地方搞起地下武装力量。当时我们全部换成便衣,每人赶一辆二饼子牛车,装成贩碱的人,从定边出发,先到鄂旗碱湖拉上碱,转到包头去卖。一方面作为掩护,另一方面也筹集一些活动资金。

我们每天起早贪黑,一个劲儿赶路,走了三天才到了三段地,这里是陕甘宁边区的一个据点。工委书记田万生、保安处长黎光等领导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,作了重要指示,叫我们休息一天再走。

黎光处长分别和我们谈了话,了解我们每个人的详细情况,并帮助我们分析形势,研究今后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组织考虑到我年轻,又没有白区工作经验,因而重新决定将我暂留三段地工作。给我的任务是和康思源搞巡逻侦察,每日往返几十里路,在三段地与宁夏交界处,侦察马鸿逵匪军的动态。

一九四六年五月,上级调我们到定边保安处工作。当时保处设在定边镇一个“福兴永”的旅店,以旅店作掩护,进行地下秘密联络工作。定边镇自古以来就是塞内外南北交通要道,来往商贾旅客很多,占据这个地点,一方面便于侦察情况,一方面也可以搞些经济收入。我在店里当了店员。旅店每天要接待许多人,有出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,也有真正的资本家和大商贾。在这样的险恶环境里工作,使我增加了不少胆识,受到了极大锻炼。

在这里工作了几个月后,已进入一九四六年的冬天。当时根据地形势发展,我们的身份都已公开,不需要以旅店作掩护了,就把这个旅店卖给一家姓高的了,这个高掌柜后被马鸿逵匪军杀害。以后,我被分配到保安处外勤科,搞了“特费”发放工作。

三、初受磨炼

一九四七年初,国民党大举进攻陕甘宁解放区,反动气焰十分嚣张。我保安处接到上级命令,叫选拔一批机智勇敢的青年,组成武装侦察排。我被选上了。从此,我脱离了“特”工作,成了一名光荣的侦察队员。这年的上半年,党中央进行了战略转移,主动放弃延安。我保安队根据斗争的需要,改编为独立大队,统一归三边警备旅指挥。独立大队共五、六百人跟随司令部,负责守卫站岗、侦察联络、管训俘虏及后勤工作。

马鸿逵大兵压境,占领了盐池县时,我三边警备旅充分做好了战斗准备,坚守定边城。定边距盐池县仅有六十华里,我们日日夜夜守在城头上,爬在战壕里,傍晚用沙袋子堵住城门,随时准备回击敌人的进攻。

一天,部队首长突然交给我一个任务:给三段地工委送一封信。信的内容是:“火速东退”,写在指头大的一个小纸条上,为的是一旦被敌人捉住,可将信一口吞掉。当时,马鸿逵匪军对定边通在三段地的道路,监视得十分严密,为了能顺利突破敌人的封锁线,临行前部队首长特意给我换了一匹好马,并再三叮嘱。

第二天凌晨,窗户纸发青我就骑马出发了,一上马,恨不得一下飞到三段地。那一带的地形特点是,山势不高,过一道沙梁下一道坡。我在飞马前进中,脑海

里不断想着临行前首长对我的再三嘱咐:上坡时加快速度冲上去,防止迎头碰上敌人,让其占去有利地形。抢先占据高处,登高望远,能及早发现敌人,打主动仗。走到半前晌,当我扬鞭策马奔上一面大坡时,果真瞭见一群敌骑朝我这个方向驰来,我立刻掉转马头翻过一条深壑,越过一架山梁,把敌骑甩得无影无踪了。当我绕道又向目的地奔驰时,突然发现一股敌骑,从前方的斜坡直插下来,打头的敌人离我仅仅只有三百多米远了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,我先发制人,首先向敌人开枪射击,接着掉转马头疾驰而归,当敌人爬上高处时,我已经跑得很远了。敌人追了我一段,看看无法追上就回去了。

当我逃出险境,返回定边时已经黄昏了。当时马和人都从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首长,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。我把路上遇险的经过向首长作了汇报,首长不但没有批评我,反而对我进行了安慰。尽管如此,我仍长时间为自己没有完成任务而内疚着。几天以后得知,三段地工委安全转移了,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四、打回伊盟去

一九四七年三月的一天,马鸿逵匪军出动骑兵和步兵共七个团,向我定边发动进攻。清晨战斗打响了,枪炮齐鸣,敌人还有飞机配合,战场上硝烟弥漫,一片火海。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,持续打了十多个小时,以后部队撤退到定边一百多里的南山打游击。

一九四七年六月,组织决定调我到吴旗党校学习。在学习期间得知伊盟支队正式成立了,并得知高增培任政治委员,王悦丰任司令员,高平任副司令员。听到这个消息,我这个从伊盟出来的战士多么想回到家乡的队伍里出点力啊!盼啊盼,终于盼来了高政委。高政委是我们在延安时的上司,他来到吴旗党校后,我向他提出参加伊盟支队的请求。经过多次要求,高政委终于答应了。一九四八年初,我正式到了伊盟支队。两个月后,我们这支骑兵队伍,从吴旗出发,辗转至准格尔旗打游击。路经神木、高家堡等处,亲眼看到白区人民的困苦。那时,春天的消冰水缓缓地流着,有时还漂着冰凌,天上下着蒙蒙细雨,雨中忽而夹杂着雪花。扶老携幼逃往红区的老乡们,涉着齐腰的河水,忍受着刺骨的寒冷。看到这种情景,我们更加憎恨敌人,人人抱定决心,勇敢杀敌,尽快解放白区人民。

打回伊盟的第一仗是参加解放神山的战斗。主力部队是神府方面的四六团。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作战。从五字湾出发,连夜赶往神山战场。由于向导迷了路,天明才赶到神山附近。主力部队已将顽敌打垮,正赶上败退下来的敌军,我们与四六团前后夹击,敌人没有退路,只好全部交枪投降。这次共俘虏敌人三百多名,其中有准旗王爷兼警备司令的奇永泉和有名的“郝团长”郝茂林。与“郝团”齐名的“黄团”在人民军队强大的攻势前,不久也全部起义投降了。

在打扫战场时,我们出于极度仇恨敌人的心情,把缴获的一辆小轿车的轮胎全部扎坏了,因而受到上级的批评,这成了我们幼稚无知的一个笑柄。以后,高政委见了我们总要说:“你们这伙楞头青,就能戳漏子!”

(未完待续,摘自《继往开来》)

红色历史 红色故事